

從同溫層降落：

以責任重新扣連的大學（生）與社會

成大台灣文學系四年級／吳克威

「人所知道的世界，正是她／他看見的周遭世界——而通往這個世界的管道是有限的、階序化的，並以越來越高、越來越大的高牆護衛著它。而高牆外的世界，全都被視為虛構、杜撰的不經之談。雖然理性的心靈可以接受活在對立的兩個世界（此處和彼處）裡，但是，能活在非對立的兩個和多個世界——全都座落在同一個空間——必然會銘刻出沈默。不是從地方，更切確地說，從在此處的他方。」

—鄭明河，《他方，在此處：遷居、逃離與邊界記事》

如果足夠「安分」，大學生與周遭的社區、社群可以僅僅是斷裂、不連續的關係，像是日常的短暫買賣、交通時不曾交會的眼神，於是城市碎散成校園與住處之間不具有整體意義的空間，因此，即便臺南不具有地下的交通網絡，生活中往來的移動仍舊像是乘坐地鐵，到了站了意義才得以發生，也凝聚出同質性極高的社群，對世界的認識從此成為同溫層的延伸。

從大氣的角度來看，同溫層也稱為平流層，距離地面約莫十公里左右，是一個能見度高、受力穩定、噪聲污染小的地方，適宜飛行，然而，一旦下降到對流層時則會開始遇見雨、露、雷電等天氣變化，對太過習慣同溫層晴好日子的人來說，不免恐懼、傷心。

某種程度上，《WuTalk！臺南在地誌》這樣一本以外地學生為主的刊物團隊，正是在對周遭環境的陌生與太過怡人的同溫層中突圍的嘗試，於是從2017年末，

團隊蹲點在青年路上，撰寫一整天的青年路究竟發生了哪些勞動故事，次年發表了《六分之一個__的工作天：青年路勞動者日常》這本紙本刊物。在與圖書館合作舉辦的新書發表中，邀請了《靜寂工人》的作者魏明毅與台文系副教授簡義明（同時USR計畫官田場域共同主持人）進行對談，會後老師向我簡述了USR計畫的內容，同時詢問《WuTalk》團隊是否有意願到正在進行C類計畫的官田場域進行下一期刊物的工作，是《WuTalk》創刊四年來第一次以專題企劃的形式走出市區的範圍。

對一般學生而言，抵達官田有兩種主要方式：自己騎機車或是搭火車到隆田、拔林站，但無論如何抵達，從視覺來說都是新奇的經驗，特別是內心建立著要寫報導的預設時。慣於在城市裡行走，說故事的習慣是找尋人為的脈絡，一點一點往古老的時間走去。然而一旦移動到城市之外，歷時性的想像如樓



房高度一般漸次收折，接近土壤，人為的事物變得碩大、突兀，無論高壓電塔、高速公路或鐵皮屋的紋理都不具備走回過去的時間軸上的意義。

換言之，閱讀的能力被取消了。作為人文訓練背景的學生，我無法閱讀稻穗、菱角、水圳……等，命名系統的破產與過往人文知識訓練無法立即套用在所見之物的情況下，如何尋求另一套符號系統網羅陌生的田野？寫作如何可能？有什麼意義？這樣本質性的問題迫切被要求回答，無論在自己內心或在夥伴們之間都是，而雜誌的編輯企劃本身正是回答的一種嘗試。

經過團隊的討論，大家選擇了由蔡郁柔提出的「水生水田」計畫作為這次編輯企劃執行的主軸，核心的概念在於「水是命脈」，以烏山頭水庫與嘉南大圳支撐起的水利系統為背景，近距離的看待傍水而生的種種。我後設的解讀是，總共五篇的「水生水田」計畫前面兩篇處理烏山頭水利系統的建置，以及官田的生態環境，是關於下層建築與物質性的基礎。而後續的三篇則書寫在不同時間尺度上，人們如何進行在地實踐、日常生活如何操演成「地方芭蕾」？則是上層建築的部分。

這樣的架構並未輕易的解決知識斷層上的焦慮，在過往寫作慣習難以施力的狀況下，寫作者們的對應策略是非常值得觀察的，幾



種顯著的路徑是，尋找過往的文獻輔以口述歷史重整，拼湊出地方的脈絡；其次是近距離的貼向某位報導人，亦步亦趨的再現他所指出的路徑；最後則是尋求某種客觀新聞報導寫作的範式，以最保守、不犯錯的姿態守在語言的邊緣，遙遠的進行素描。無論哪一種都意味著寫作主體的後撤，與地方交會（betweenness）的時刻被神秘的取消，無法置身事中（getting in personal）。

純粹思想層次上的反思是，直接經驗而得到的知識是難以取代的，透過書本、口述再現的資訊有高度的局限性，部分的原因在於感同身受的困難，反身性（reflexivity）的思考無以成形。而在實踐上，我和郁柔開始每週到官田報到的任務，對我來說這是一場開闢水道的過程，對自己的無知之處進行挖掘，重新通往並改變已知的流向。





首先是兩條脈絡性閱讀的路線，其一是從烏山頭水庫出發，老實的用雙腳實踐編輯企劃裡從水源到官田各處的安排；其二則是在偏重農業的編輯企畫裡所缺乏的工業與畜牧業的探索，新的認知地圖於焉展開，也意味著必須重新定位並老實鑽探我們在地地方上所認識的人物，於是「交會」不僅止於對土地的第一手觀察，「方向感」的測定，也在於與不同地方人士對話的過程裡，重建關於官田的知識體系。

在累積越來越多車票與油錢發票後，接壤的機會逐漸發生，起初是在工業區散步時複習起馬克思，笨拙捉住接連學科訓練的線頭，沿著走，我們在官田的飯桌上聊起同婚議題，在田地旁的小木屋裡聊起韓國瑜和吳音寧，不同背景產生的意義框架碰撞了起來，有時感到風雨交加，有時日出晴好，理論知識與時事的回返不意味著掏出身上的慣性，狡詐的暗渡，而是更清楚的看見身上的空虛，打開好奇，也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原始謎題，從被動的學習、接受挺身，在田野裡、熟稔的知識之外找尋回應的可能。



就我個人與《WuTalk》的夥伴而言，USR創造的接口不僅止於《WuTalk》的書寫計畫，也包含與建築系合作的隆田關懷據點的修繕、菱角季展示攤位的設置、農牧共好工作坊……等。在隆田關懷據點修繕及後續策展著力很深的夥伴蔡慎祐向我提及，USR計畫帶給他一個機會好好看官田，因為有任務在身，一次次的抵達變得有所期待，遭遇的人們是動人的，特別是在路上和曾見過的身影相遇時，「我會覺得好酷，這個曾經和我沒有關係的地方居然能見到認識的人，開始變成熟悉之處」。

USR計畫的出現，是對大學與社會脫節的反省，針對這個現象，作為台灣文學系所的學生，危機感是更巨大的。在新自由主義化下的世界，無論地方或是學科（特別是人文學科）都被迫切要求回答自身有何價值？我認為不落入圈套的回答或許論述的焦點就不在著眼於經濟價值，而在社會價值，這份社會價值的創造或許透過的就是像USR這類計畫的觸發，在田野重思自身座落於世界中的位置，嘗試從同溫層降落，所經歷的風雨雷電是對既有框架的挑戰，也是

回應的起點，從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角度來說，這正是學習的開始：「學習的意思是指：當重要之物趨近，你必須盡力做出回應（To Learn means to make everything we do answer to whatever essential address themselves to us at the given moment）」。

被「重要之物」所驅動的「回應」本身正是一種「責任」的實踐也是一種倫理行動，「不再只執著於主體的存有（being），而採取行動來回應他者的需求，



視此回應（response-ability）為責任（responsibility），這是法國哲學家Emmanuel Levinas所說的倫理：主體最重要的結構不在於『我』，而在於對『他者』的責任」（邱貴芬，《「看見臺灣」》），換言之，行動的開始是對邊界的重探，以「責任」重新扣連大學（生）與社會，同時回到個人身上，社會責任的意義不僅是個人為社會做了些什麼？同時也意味著動態的主體建構，真正成為（becoming）具備自覺性的當代公民主體。

